

20

黄修己 主编

中国文学史

世纪

上卷

中山大学出版社

I209.6/72

黄修己 主编

中国文学史

20

世纪

上卷

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黄修己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8

ISBN 7-306-01460-9

I .20… II .黄… III .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209.6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30.25 印张 753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上卷作者：

黄修己	张海元	陈政	吴锦润
邓国伟	吴定宇	李伟江	柯秀经
申洁玲	刘炎生		重阳
姚玳玫	艾晓明	限	

使用说明

一、本书内容包含中国近代文学的最后十余年、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将这些时段的文学史合并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高校中文系课程体系、内容改革的一种趋向。

目前有的高校中文系，已将原设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程，合并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但也有的仍行旧制。因此本书特编成上下两卷，对现当代仍然分授的学校，上卷即现代文学教材，下卷即当代文学教材，可以分用。

二、对仍将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结尾来讲授的学校，本书第一章“前五四时期”文学的有关内容，如果已经讲过，此章可以不讲。但应要求学生自学，以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

三、本书下卷包括本世纪我国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湾香港文学等章节，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或讲授有困难，或已另设上述内容的专题课、选修课，因此如何讲授这几个章节，可以根据各校实际情况自定。但应要求学生阅读这些章节，以全面掌握我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

四、文学史的教学当以讲授、学习作家、作品为主。为了改

变以往过于偏重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次要作家所占篇幅过多等状况，本书将这些内容集中于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一章。讲授这几章时，应要求学生掌握百年来文学发展的概貌，对此有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重点学好百年来最杰出的作家作品。

五、本书的编写带有试验性，必有不完备之处，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望能及时告诉我们，以期改进，不胜感激。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前五四时期”的文学(1900~1916)	(21)
1. 大转变的前夜	(21)
2. “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28)
3. “小说界革命”和新戏的诞生	(40)
4. 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观	(56)
5. 跨进现代文学之门	(63)
第二章 从启蒙文学到共和国文学(1917~1949)	(77)
1. “五四”文学革命	(77)
2. 文体革命的成功	(90)
3. 从人的文学到阶级的文学	(101)
4. 分化、搏斗中共创辉煌	(114)
5. 救亡文学和抗战文学	(128)
6. 共和国文学的雏形	(145)
第三章 鲁迅——20世纪中国文学巨人	(171)
1. 鲁迅生平 and 思想历程	(171)
2. 《呐喊》、《彷徨》等小说集	(180)
3. 杂文艺术的丰碑	(197)
4. 璀璨夺目的《野草》等作品	(201)
第四章 “五四”后新诗的诗成就	(209)
1. 郭沫若的《女神》等诗集	(209)
2. 闻一多、徐志摩和新月诗派	(220)

3. 冯至等的诗	(233)
4. 戴望舒和现代诗派	(241)
5. 艾青和七月诗派	(250)
6. 穆旦和九叶诗派	(259)
第五章 小说创作的硕果 (一)	(273)
1. 为人生派和问题小说	(273)
2. 郁达夫和青春小说	(279)
3. 乡土小说家	(286)
4. 茅盾的《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	(293)
5. 张天翼、沙汀等的小说	(305)
6. 李劫人的《死水微澜》等小说	(313)
第六章 小说创作的硕果 (二)	(320)
1.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说	(320)
2. 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小说	(328)
3.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337)
4. 现代派的小说	(346)
5. 女性小说家丁玲、萧红、张爱玲	(355)
6. 钱钟书、路翎和赵树理的小说	(367)
第七章 散文、话剧等其他文学品种	(385)
1. 朱自清、冰心的散文	(385)
2. 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	(392)
3. 何其芳、梁实秋的散文	(400)
4. 曹禺的《雷雨》等话剧	(407)
5.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话剧	(418)
6. 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	(425)
7. 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的成就	(431)

导 言

20 世纪即将和我们告别了！

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能说是一瞬间。然而 20 世纪这一百年，无论对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是对我们的文学艺术来说，都太重要，太不平凡了！

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国由一个破败、凋蔽的，面临亡国灭种之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过艰难曲折，流血牺牲，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富强而奋斗。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回想本世纪的开头，1900 那一年，历史并没有让中国人欢天喜地来迎接新世纪，却残酷地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惨剧。写在本世纪中国历史第一页上的，竟是这样的奇耻大辱！再来看看今天，尽管现实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前进的路上还会有风浪，但毕竟中国人站起来了，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沧海桑田”这四个字，似已不够用以形容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了。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同样经历了巨变，从延续了几千年的

古典文学，转变为崭新的现代文学，这是几千年才有的一变！经过近百年来作家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在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以人类史上少见的规模，广泛吸纳外部世界先进的、新鲜的文化 and 文学养料，创造了一批优秀的新文学作品，有的堪称本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们描绘了百年来的时代风云，反映了历史的大变迁，展现了一个世纪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新增的精神宝藏。

这是伟大的变革，这是伟大的创造。这变革，这创造，当然是不平静的，充满着大痛苦，大欢乐，大胜利，大挫折，大进军，大迂回，大喜大悲，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这里有多么丰富的、值得珍视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跨世纪中国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文学工作的人来说，多么值得去了解、学习、认识、思考、总结。因为历史从来都是我们的良师。

二

本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在世纪之初的第二个十年，即习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以实现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1卷名为《青年杂志》），发动了一场猛烈地批判以孔教为中心的旧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又在1917年，倡导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新文化运动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而“五四”运动反过来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所以历史上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革命，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是近百年来文学上最重大的事件，此时20世纪已经度过十几个年头了。

但文学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从远处说，是1840年鸦片战

争后，持续不断的救亡图存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从近处说，有本世纪开头十几年间社会变动和文学变动的酝酿和准备。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的严重危机。爱国的志士仁人一直在思考着拯救民族之路。起初，只看到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败我们，因而幻想“以夷制夷”，取西方之技艺，行器物层的变革。但甲午（1894）之役，新式海军北洋舰队被日军击溃，使人们进而看到中国失败的更深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的腐败，于是开始求制度层的变革。这就有企图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的戊戌维新运动。然而这场运动仅百日便惨遭镇压亦归失败。接着便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继续进行更彻底的制度层变革。同时，作为戊戌维新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梁启超等人，从失败中又进而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更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民群众的不觉悟，为制度层变革的成功，必须改变国民之魂，进行精神层的变革，于是提出“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①。他们企图从文学的变革入手，以文学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有了精神层变革的要求，才有文学上的改良和革命，才促成了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这时，正是20世纪的一抹曙光，照临中国大地之时。

按照时下依革命性质划分文学阶段的成规，20世纪开头的十几年，被包括在近代文学史（1840~1919）中，又笼而统之地把近代文学称为“新旧文学的交替时期”。但如果翻开任何一个版本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的60年，内容不多，新的因素更少。进入20世纪后，这开头的十几年里，内容相当丰富，才真有“新旧文学的交替时期”的容貌。因此近代文学史显得头轻脚重，几乎可以以1900年为线（或以1898年为线），划出前后两段。事实上，19世纪的60年，并非没有内容，只因这内容属旧文学，便被一笔抹杀，或被轻轻带过了，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此时占着

主流文学地位的，还是旧文学。

这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有着辉煌历史的旧文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一些人已经看到旧文学衰亡的趋势，他们企图挽救、复兴旧文学，便努力来做抢救工作。例如著名的曾国藩领导的“桐城中兴”，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都是大古文家。曾氏幕僚、友人中还有俞樾、莫友芝、郭嵩焘、李元度、吴敏树、方宗诚等古文名家，形成颇有声势的文学集团，经他们的努力，这个清朝最主要的散文流派，又一度兴盛了起来。连后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准备有过重要贡献的严复、林纾，也是桐城古文大家，被人称为曾国藩的再传弟子。诗歌方面有同样得到曾国藩扶持的“宋诗运动”。前有“学人之诗”的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后有“同光体”的陈三立、陈衍等。此外还有亦以复古为号召的，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有“常州词派”的“词学中兴”，出现谭献、庄域、陈廷焯、冯煦、王鹏运、朱祖襟、郑文焯、况周颐等一批词作家；还有中晚唐诗派，如李慈铭、樊增祥、易顺鼎等。这诸多流派所做的是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挣扎，构成了这一段文学最有历史特征的现象。一些近代文学史著把它们当作逆流，但无法否认：“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②这“愈来愈多”不正说明此时旧文学仍有不小势力，仍在发展吗？现在，人们多已认识到如宋诗派、汉魏六朝派、中晚唐派等诗派，“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要比新诗派诗人大得多”^③。这就是说，19世纪的后六十年，虽在社会变动的促使之下，文学产生了新因素，如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以及谭嗣同、夏曾佑等的新派诗，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的新体文，但从总体上看，“文学变革的步子跨得不大”^④，变革尚未成为文学的主题，新旧交替之势未成。正因为新的力量不足，才把龚自珍拉来做了近代文学的首席

演奏家。然而，龚自珍于1841年便逝世了，其时中英《南京条约》尚未签订。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便已逝世的人，怎能做鸦片战争之后的最重要的作家呢？岂不让历史感到尴尬吗？然而没了龚自珍，19世纪后半期的近代文学便没了重量级的作家。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此时新的因素还很弱，旧文学还坐在主位上。这时期是古典文学的延续、挣扎，企图复兴，是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和尾声的时期。只有到了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在梁启超正式发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之后，一个“新旧文学的交替时期”才说得上真正开始了。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了大变动。

历史的安排有时是那么巧妙的，偶然性往往会爆出色彩绚丽的火花。好像专门为了迎接20世纪，梁启超在1899年12月底，在19世纪仅剩的几天里，于《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正式发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号召。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响起了变革中国文学的呼声。于是，历史的脚步一踏进20世纪的门槛，一场文学大变革的准备工作便立即启动。从这时开始到1917年文学革命爆发，这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两件极重要的事情。一是市民文学的繁荣，用一种“半新半旧”的东西抢占了主流文学的地位；把古典文学，即旧文学，挤向边缘。二是培育了新文学的创造者和接受者。若不做成这两件事，便缺少变革的内部条件，则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变，是不可能爆发文学革命的。为了深刻地了解“五四”文学革命，了解新文学的发生，弄清本世纪开头这十几年里社会和文学的变动，便是不可或缺的，也因此，我们把这十几年称为“前五四时期”。

这时，在“文界革命”号召下，“新文体”得到发展，带有从古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特征。1902年，梁启超又号召“小说界革命”，引起小说观念大变动，产生了四大“谴责小说”，产生了市民文学的主要流派鸳鸯蝴蝶派，出现了世纪初小说的大繁荣。

西方话剧开始被引进，尽管“新戏”（“文明戏”）有诸多不足，毕竟从此有了中国的话剧运动。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尽管还很杂乱，却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成了文学革命的极大助力。而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也有了在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下的新文学观念，他们的理论成果已有与现代世界文艺思潮接轨的迹象。这许多新事物、新气象，都是 19 世纪时期的近代文学所没有的。进入 20 世纪，才有了上述这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构成的新开端，与稍后的文学革命，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是为“五四”文学革命做准备的。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很明白的事实吗？不应该再把 20 世纪开头这十几年，挂到 19 世纪文学上，去做古典文学的小尾巴；应该如实地归入 20 世纪文学的范畴，作为一场大变革的开场锣鼓。

三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都有了明显的变动。城市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封建时代的郡县都邑，已渐渐成了现代的城市。印刷业、出版业随之发展，报纸杂志数量剧增。19 世纪末报纸还很少，1901 年梁启超回顾说：“以京都首善之区，而自联军割据以前，曾无一报馆，此真天下万国之所无也。十八行省每省之幅员户口，皆可敌欧洲一国，而除广东福建外，省会之有报馆者无一焉，此亦世界之一怪现象矣。”^⑤梁之所言并非据精确统计，但事实大致如此，他的印象才这么深刻。进入 20 世纪，情况大变，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报纸数量激增，出现许多《白话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据统计全国报纸已达五百家^⑥。报纸与刊物的风行，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绝大多数报纸都设副刊，都要登载合读者口味的文学作品。如 1900 年 5 月创刊的《中国日报》，副刊名《鼓吹录》，开了副刊登杂文的

先河。这杂文后来成了现代文学中颇有特色的品种。随后创刊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与杂文发展的关系亦甚密切，其坚持时间最长。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如反映太平军起义的《洪秀全演义》（载香港《少年报》）、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载《世界繁华报》）、鸳鸯蝴蝶派代表作《玉梨魂》（载《民权报》）等，都是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出版业的兴盛同样于文学发展有大大关系，一些出版社出版文学或与文学有关的期刊，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小说月报》（1910年创刊）等。报纸杂志书籍的出版，多是纯商业性的，不能不照顾读者的需求。而当时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随城市发展而壮大的市民阶层。梁启超的“新文体”以能适于报刊读者口味而得以风行，所以又称“报章体”。连载小说更是副刊的主要“卖点”，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繁荣。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还有黑幕小说、侦探小说等，正因为适合大多数市民的文化消费需要，能满足他们的审美趣味，才得以生长、繁荣。话剧（“文明戏”）初入中土，在商业化的演出中，不得不迁就市民观众的趣味，以致被人视为“堕落”。“诗界革命”成绩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保持着旧诗样式的“新体诗”，不受市民的喜爱，缺少群众基础。而桐城派、“选派”、宋诗派等已被挤压得收缩到日渐没落的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去了。它们与此时已成为文学的主要接受者的市民阶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本世纪初文学的繁荣与梁启超等的号召有重大关系，但梁的本意在于“新民”，结果却是促成了市民文学的发达。他对此很不满意，于1915年时说过：“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来增加百倍”，但“其什九则海盗与海淫而已，或则尖酸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①。中国的市民不同于西欧的市民，中国的市民文学也难以转化出取代封建旧文学的现代新文学来。须要另外来培养现代新文学的创造者，而且还要培养它的接受者。早已悟到思

想启蒙意义的鲁迅，创办《新生》失败了，与周作人合译两卷《域外小说集》，竟只售出四十册左右，都说明接受者的作用。后来他的《阿 Q 正传》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如果早若干年问世，恐怕只能在《开心话》专栏里登到底。19 世纪未及培育出的新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待到进入 20 世纪，就在其开头的十几年里，被较大规模地造就成功了。

跨入 20 世纪，已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不得不进行某些改良。1905 年废科举，国内官办的不同等级的新式学堂在各地兴起，加上外国人在华所办的学堂，所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渐多起来了。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包并取”的原则，不仅推动各种新学理的输入，更培育了独立思想的风气。中国向欧美和日本大批派遣留学生，很快造成了一大批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激进的青年先锋，这些人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革命的中坚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无一不有留学的经历。而在各级新式学堂里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再只学子曰诗云，所修除国文外，尚有算学、格致、舆地、史学，乃至西文、商业、体育诸课程。青年学生受现代思想气息的熏染，便再也不满足于谴责、言情之类作品。他们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和社会思潮，与传统的忧患意识相结合，便成了不满现状，追求民族新生、个人新生的巨大动力，成了拥护文学革命，创建或接受现代文学的基本力量。出版事业的发达，版税和稿酬制的实行，又提供了脱离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路的可能，于是出现了不再依附于官府，单靠个人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体。他们的力量大到能使清政府从法律上保护他们的利益。1910 年（宣统二年）清政府公布了《著作权律》凡五十五条，承认“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承继人继续至三十年”。并规定

“著作物经注册给照者，受本律保护”^⑧。后来北洋政府亦于1915年公布新的著作权法。在法律维护下，以写作为生有了保障，像著名的李伯元、林纾，都有机会踏上仕途，却都被他们拒绝了。他们类似今日的自由撰稿人。这一群体的出现，对于现代文学的诞生是极重要的条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皇权崩塌，祖宗陈法动摇，社会生活起变化。这时思想上的反孔教、反封建形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了这样的准备，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猛烈地批判正统的儒家思想，才有了可能。有了彻底的思想革命，才导致全面的文学大变革。

以上事实说明，1900年后的十几年里，无论在社会条件或文学自身条件上，都已为一种崭新文学的诞生做好了准备。把这十几年置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头，作为20世纪文学大变革的开端或准备，更能够揭示这一段文学的历史特征，更能够准确地显示它的实际的历史位置，也是讲清楚现代文学的诞生，讲清楚20世纪文学的脉络所需要的。只有这样，“五四”新文学才不至成为无源之水，才不至把外来的影响（又无论是来自何方），视为决定的因素。我们的这一见解，并非创见，一些前辈学者、作家，早已提出“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一些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已经在动摇着旧文学的阵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五四’新文学运动准备条件。至于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这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现代文学史的前边也应有一定的篇幅论述。”^⑨这也说明将本世纪开头十几年与“五四”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连在一起，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